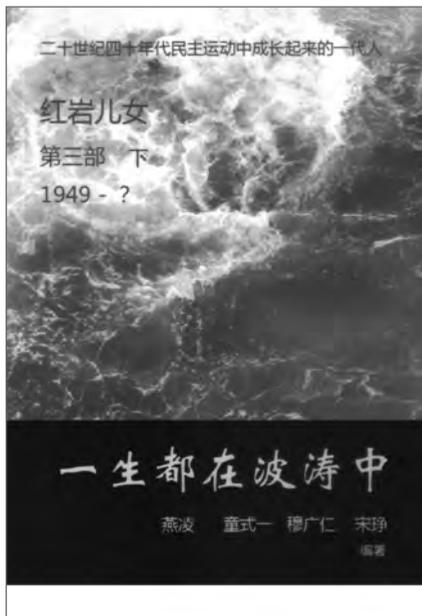


前後「十六字方針」： 白區地下黨的宿命

——讀《紅岩兒女》、《拒絕奴性》等 「兩頭真」傳記

● 裴毅然



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一生都在波濤中》，第三部，下冊（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

1949年9月南京整黨前，中共中央點名並傳達四個地區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南京、福建、廣西、



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

雲南^①。其他未被點名地區的地下黨系統幹部一直感覺不對勁，遭到莫名冷落，頻遭南下軍幹擠兌，全

《紅岩兒女》、《拒絕奴性》均涉及「後十六字方針」，除了列示作者查證「後十六字方針」的過程及論據，具體凸顯地下黨遭受整肅的細節，還深入分析地下黨這一宿命的根源。

國地下黨整體吃痛，但他們不明白「為甚麼」？《紅岩兒女——一生都在波濤中》（以下簡稱《紅岩兒女》，如無特別註明，均引自第三部下冊，只註書名和頁碼）、《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以下簡稱《拒絕奴性》，引用只註書名和頁碼）兩書，對1949年後地下黨系統遭整肅提供了一系列資料，最核心的內容是他們萬萬想不到「母親呵——黨」竟會有一條「後十六字方針」。

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戰軍（「二野」）請示中央：如何對待地下黨？中央回電：「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此驚心動魄的「後十六字方針」，尚未卸磨就準備殺驢，顯屬過河拆橋。據穆廣仁先生的說法，「後十六字方針」絕對機密，僅傳達大區負責人一級（《紅岩兒女》，頁709-10）。忠誠的地下黨員晚年得知「偉大領袖」竟早有淘汰自己的宏觀規劃，如此這般對待「革命搖籃」的地下黨，將他們第一批送上「無產階級專政」祭壇，及至文革則是「淘汰」規劃的最後一章（《紅岩兒女》，頁714），那份錐心之痛，當年出生入死、捨身為黨的壯烈價值，全都漂起來了。

1949年4月中共大軍渡江，望屋而食，接收國民黨剩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幹部缺口百餘萬。1949年，中共黨員300萬，70%來自農村，僅11%受過教育；這11%中，僅1%為大學生^②。國民黨時期官吏總數200萬，中共此時僅有72萬合格人才，缺口近2/3^③。但中共偏偏對熟悉城市且「合格」的地下黨知識份子幹部棄而不用，或

控而用之。「紅岩一代」明顯感受到從上面吹來的陣陣冷風。

1980年代後期，四位原中共南方局系統離休幹部何燕凌、童式一、穆廣仁、宋瑋，自費啟動「晚霞工程」，歷經二十年努力，於2005年起陸續發表六卷本傳記叢書《紅岩兒女》。可這套紅色人物傳記叢書，在中國大陸只能出版1949年前「英勇奮鬥」的第一、二部（共四冊）^④，不能出版1949年後「含冤蒙難」的第三部（共兩冊），此後一直未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手出版後兩冊。「偉大母親」只承認他們「為奪權奮鬥」的前半生，卻迴避「遭到專政迫害」、時間更長、更有「價值」的後半生。第三部《紅岩兒女》，2008年只能於「資本主義淵藪」的香港出版^⑤。2012年，香港真相出版社再出全套《紅岩兒女》增補版，三部共六冊。

另一位資格更老的紅色女傑陳修良，1926年春入團，1927年4月由向警予介紹轉黨並任向秘書，曾留學蘇聯，1946年4月任中共南京地下黨第九任市委書記（《拒絕奴性》，頁182）。1994年5月5日、1998年10月8日，江澤民兩次前往上海華東醫院榻前探望^⑥。但陳修良自傳《拒絕奴性》也不能在「鶯歌燕舞」的中國大陸出版，2012年也只能在香港面世。

《紅岩兒女》、《拒絕奴性》均涉及「後十六字方針」，除了列示作者查證「後十六字方針」的過程及論據，具體凸顯地下黨遭受整肅的細節，還深入分析地下黨這一宿命的根源。本文撮精聚濃，重點介紹兩書有關「後十六字方針」之詳末。

一 「前十六字方針」

為說明「後十六字方針」，得先介紹中共對國統區地下黨的「前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紅岩兒女》，頁709）。這一白區工作方針抗戰前就形成雛型。1936年3月，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就向下屬發布這「十六字」^⑦。1937年3月，閩西游擊區領導人方方遠赴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當面喻示十六字——「埋頭苦幹，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作為白區組織工作原則^⑧。1940年5月5日，中共書記處電令各地省委：為隱蔽身份，加入國民黨不必事先通過組織^⑨。其時，地下黨乃中共不可或缺之「第五縱隊」——搞情報、策「兵運」、擴組織、輸物資、宣傳赤化、發動學運工運、爭取國統區民心、影響國際輿論……中共奪權儘管以武裝鬥爭為主，畢竟還需要城市地下黨的「第二條戰線」。1943年春，毛澤東在延安對第一次見面的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⑩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中共黨內流傳兩句話：「二萬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萬五千里指長征，蘇區武裝鬥爭；三千六百日，指十年白區地下黨鬥爭^⑪。

二 「後十六字方針」

受了三十年冤屈的地下黨員晚年聞知「後十六字方針」，當然很有

「興趣」。2004年秋，穆廣仁從友人信件中與聞「後十六字方針」，開始「求證」。穆廣仁，1947年入黨，南方局系統地下黨員、新華社前副總編。因檔案封閉，穆廣仁等只能求證知情人。陳修良之女打電話諮詢消息來源的老H，老H告知資訊來自昆明M。昆明M再告知穆廣仁，「情報」來自一位見過「後十六字」文件的西南局老同志。一位1950年代任職安全部門的老同志也說聞知「後十六字」。另一位研究黨史的南京老同志告訴穆廣仁，1990年代江蘇省安全廳負責人C查閱檔案時，發現南京易手不久後發出一份電報，內容關於中央某領導向毛澤東請示對全國地下黨的處置方針，毛批下這十六字，限達大區負責人（《紅岩兒女》，頁710）。

李普（新華社前副社長）應穆廣仁之請，諮詢1950年代初中南局秘書長杜潤生。2006年2月，杜老回答曾親見「後十六字方針」文件。李普認為，從「後十六字方針」文風、氣勢看，與毛澤東行文習慣一致；再根據毛對知識份子的一貫偏見與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矛頭，也只能出自毛的手筆，別人沒有資格與膽略敢發布這樣的指示。李慎之認為，「後十六字方針」並非僅僅針對南京地下黨，而是針對全國地下黨（《紅岩兒女》，頁709-10）。陳修良在自傳中也說攻佔上海後，毛澤東明確接收城市的領導班子「以南下幹部為主」（《拒絕奴性》，頁279）。

中國大陸史家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收入「後

李普認為，從「後十六字方針」文風、氣勢看，與毛澤東行文習慣一致；再根據毛對知識份子的一貫偏見與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矛頭，也只能出自毛的手筆，別人沒有資格與膽略敢發布這樣的指示。

《拒絕奴性》詳盡披露了鄧小平的「南京報告」。報告意在解決南下軍幹與南京地下黨日益激烈的矛盾衝突，核心則是打壓地下黨，指示全面整頓南京地下黨，明確要求地下黨必須服從南下軍幹。

十六字方針」，並附長篇確認性論述^⑫。根據「國情」，中共黨史類的審讀極其嚴格，「放」出如此重大情節，表明得到官方認可。綜上所述，「後十六字方針」基本坐實。檔案一旦解密，當能查到電報原件。

從史料價值角度，坐實「後十六字方針」乃是傳記叢書《紅岩兒女》、陳修良自傳《拒絕奴性》最具歷史價值的內容。

三 鄧政委報告

陳修良的《拒絕奴性》詳盡披露了鄧小平的「南京報告」。1949年9月17日，南京召開四千人大會，黨支書及排以上黨員幹部出席，二野政委兼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發表長篇報告〈論《忠誠與老實》〉^⑬，意在解決南下軍幹與南京地下黨日益激烈的矛盾衝突，核心則是打壓地下黨，指示全面整頓南京地下黨，明確要求地下黨必須服從南下軍幹（《拒絕奴性》，頁267-68）。

1946年恢復南京市委前，中共南京黨組織有隸屬華中分局城工部的「南京工作部」、隸屬蘇南區黨委的「南京特支」，還有淮南、淮北區黨委和六合、江浦縣委派出的一些組織，彼此不發生關係，政出多門，很不協調。此時，南京地下黨員也僅二百餘，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發展至近兩千，原本的「重大業績」，這會兒成了大錯誤。鄧政委報告中指出：「南京是否兩千多黨員，一個應該清洗的也沒有呢？」鄧還將從柯慶施處聽來的謠傳拈

出：「過去地下黨同志有一個口號叫做『保管好工廠，就當廠長』……這樣說你保管好總統府，將來豈不要請你當總統嗎？！」（頁181-82、270-71）台下陳修良氣極，遞條子上台反駁^⑭。鄧接閱後立即揶揄：「我們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聽了不舒服，那麼，讓他不舒服好了，將來等到他變成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舒服了。」^⑮老資格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劉曉（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不久告知陳修良：鄧小平對她「印象極為惡劣」。後來，劉曉又通過沙文漢（陳修良丈夫）提醒她，在「在鄧小平、饒漱石面前說話當心點」（《拒絕奴性》，頁277）。

陳修良聽完鄧政委報告，「氣得發抖，但沒有辦法能夠向這樣一個『大人物』進行辯論，澄清真相，討回公道」（《拒絕奴性》，頁273）。她既震驚，又感到莫大痛苦，這麼一位戰功卓著的中央級領導，竟會根據幾條謠言公開惡評整個南京地下黨組織。會場走光人了，她呆呆坐在那裏。她萬萬沒想到「勝利會師」，竟會遭遇自己人如此「誤解」。

鄧小平報告中稱部隊軍幹、南下幹部為「大兒子」，南方游擊隊、地下黨為「小兒子」，還說：「幹部配備是以甚麼為主呢？應該以解放軍來的、解放區來的幹部為主，不僅南京、上海、杭州這樣，將來到西南也必須這樣。」^⑯

鄧小平報告全長一萬八千字，為鄧氏篇幅最長文章。據陳修良憶述，1988年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擬收入〈論《忠誠與老實》〉，南京黨史辦徵求陳修良意見，陳逐條批駁該文

謬誤，明確反對收入（《拒絕奴性》，頁268）。歷史最終證明南京地下黨未混入一個「兩條心」（潛特），這篇長文最終未入《鄧選》（《拒絕奴性》，頁271）。此時，「總設計師」還健在，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

四 南京整黨

普遍而言，地下黨有文化、有經驗，熟悉城市，但不像軍幹及根據地工農幹部那樣聽話。陳修良偌大場合遞條上台，也只有深具平等意識的地下黨幹部才能做出，或許鄧小平很少遇到這樣的下屬，因而對陳「印象極差」。

上有「後十六字方針」，下有工農軍幹，各地打壓地下黨便是時代大氣壓下的「歷史必然」。南京一「解放」，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立即降任組織部長。鄧小平報告後，陳修良又在與軍幹關係上挨批，1950年初調離南京。反右時，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的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浙江省長）一起劃右，陳修良還是「極右」。根據陳修良的資歷級別，她劃「極右」須由中央審批，得經過總書記鄧小平。

1949年9月至1950年底，南京整黨未查出一名「潛特」，但仍「戰果輝煌」，除了隨二野去西南走了約500名黨員，剩下的1,400餘名地下黨員，466人受處理，其中205名開除黨籍（《拒絕奴性》，頁278）。其他處理方法包括取消候補資格、勸退、停止黨籍待審。未遭整肅的，或明或暗「控制使用」（《紅岩兒女》，頁712）。

隨二野西征或南下的南京地下黨幹部亦未倖免。鄧政委1949年9月南京講話將參加西南服務團的青年劃為六類：革命團、吃飯團、戀愛團、回鄉團、遊山玩水團、升官發財團。1950年5至12月，雲南剿匪中西南服務團犧牲九十多人，不少倖存者後淪「右派」，發配窮鄉僻壤從事苦役，有些人無聲無息死在遠方（《紅岩兒女》，頁713）。

隨着政治運動遞次展開，地下黨逐漸公開淪為黨內「異類」，一直受審查，沒完沒了，幾無「漏網之魚」。2014年6月25日，穆廣仁函示筆者：當時外調地下黨的造反派將江青等人對地下黨的污衊濃縮為：「凡沒成仁成烈的地下黨，不是叛徒就是潛特。」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登報為南京地下黨平反。若非冤屈太深，影響太大，這種「家醜」，中共豈願「廣而告之」？

整肅地下黨的直接理由是大批新黨員乃國民黨大勢已去時加入，「動機不純，成份複雜」，混入不少國民黨「第五縱隊」。另一不便說出口的理由是：我們共產黨不就是這麼幹的——「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裏」。1946年夏，西安地下黨的電台甚至設置在國民黨的「剿共」司令部^①。

五 各地情況

1949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針對本省地下黨下發指示性文件，判定地下黨品質不高，80%是一年以內的新黨員，預備黨員

上有「後十六字方針」，下有工農軍幹，各地打壓地下黨便是時代大氣壓下的「歷史必然」。隨着政治運動遞次展開，地下黨逐漸公開淪為黨內「異類」，一直受審查，沒完沒了。

李慎之、李普、何燕凌、穆廣仁等「兩頭真」晚年認識到「後十六字方針」的根子在於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利用多數工農幹部去整肅少數不聽話的知識份子幹部，亦合1949年後中共人事上的既成態勢。

60%，發展過快，明顯「拉伕」，個別地方偽縣長、民社黨、自首份子都進來了，組織性差、階級立場不穩，必須嚴格政審與清理^⑮；9月，湖南省委下發補充指示：對地下黨員的任用，盡量利用他們熟悉當地情況以及與群眾關係密切的長項，一般不宜留在機關，有能力者一般也只應配置副職，確實德才兼備又工作上不可缺少者，「應視作特殊情況，經過黨委研究提交上級批准後，可以分配負責工作。」^⑯

抗戰後成立的中共滇桂黔邊區縱隊（簡稱「邊縱」），以知青為骨幹，後發展成5萬餘人的主力，縣區民兵10萬餘，12塊游擊區，攻佔91座縣城^⑰。1949年後，在整黨、反地方主義、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雲南地下黨與「邊縱」一直是重點審查對象，定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122名省管幹部「劃右」。文革時歷屆地下黨工委委員、邊區委員、「邊縱」地委、支隊領導「都屬叛徒、特嫌」，大批長期關押，不少迫害致死。「代表人物」鄭伯克1929年入團，1935年入黨，雲南地下黨省工委書記、「邊縱」副政委，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謝富治整肅，幾乎開除黨籍。連堅持實事求是、不肯無中生有「揭發」地下黨員的南下幹部、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也被一起打為「鄭王反黨集團首要份子」。1982至1992年，雲南覆查地下黨及「邊縱」2.9萬餘人次，改正80%^⑱。

1978年，閩中地下黨負責人仍被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黨籍、逮捕入獄。福建地下黨冤案涉及千餘地下黨員，大多為廈門大

學、集美等院校知識份子。四川地下黨員約1.2萬名，次次運動挨整，1980年代初只剩下2,000餘人。江青說：四川地下黨都是叛徒。文革中，一位軍區司令公然說：「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廣東、海南的地下黨也遭「反地方主義」的整肅。廣西抗戰期間的「學生軍」冤案、陝西西北大學的地下黨冤案，都是1980年代才得昭雪（《紅岩兒女》，頁712-14）。

1982至1984年間，筆者供職浙江省政協，一批「三五支隊」浙江地方幹部，深怨前省委書記江華（井岡山出身）等南下幹部對他們的長年壓制。浙江四大「右派」沙、楊、彭、孫——省長沙文漢、副省長楊思一、省檢察長彭瑞林、財貿部長孫章錄，除彭瑞林外，均為地下黨幹部。

熬過毛時代的地下黨倖存者，文革後才有機會嶄露頭角，如西南聯大學生黨員出身的王漢斌（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東昌（後任教育部長），清華生章文晉（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上海暨大生吳學謙（後任副總理兼外長、政治局委員）。

六 深層原因

李慎之、李普、何燕凌、穆廣仁等「兩頭真」晚年認識到「後十六字方針」的根子在於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毛從實踐中認識到工農幹部聽話，麻煩少，沒威脅。起於深山草莽的中共，主要依賴農民與軍隊打天下。利用

歷史形成的多數工農幹部去整肅少數不聽話的知識份子幹部，亦合1949年後中共人事上的既成態勢。1955年上海「潘揚事件」，也是這一背景下的「歷史產物」——起於不信任的大冤案。

《紅岩兒女》透露：1980年代穆廣仁隨上海地下黨學委負責人出身的外長吳學謙出訪埃及，有一次深入的「開羅交談」。他們為地下黨員的集體命運感慨不已。地下黨員不僅為中共奪權作出重要貢獻，也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幹部，1950至1970年代正是他們施展才能的大好時段，卻成為黨內第一批祭品。較之「一二·九」延安一代，地下黨系統「紅岩一代」的命運要慘得多。等到胡耀邦時代提出知識化，地下黨有了發揮作用的空間，他們卻大多歲過花甲，胡耀邦搶時間也只能任用很少一部分出任重要職務，這部分地下黨員幹部曇花一現，很快離休（《紅岩兒女》，頁714-15）。

當然，革命早就在吃自己的兒女了。十年「鬧紅」，各根據地「肅反」殺掉自己人近十萬，遠比國民黨各地監獄殺的共產黨人多得多。1932年1月至1934年夏，湘鄂西蘇區「肅清改組派」，冤殺上萬名紅軍與根據地幹部，領導人夏曦連自己的四名警衛員都捕殺三人。9,000餘人的紅三軍殺得最後只剩下3,000餘，黨員只剩下夏曦、關向應、賀龍、盧冬生四位。一位湘鄂西根據地開創者臨刑前質問夏曦，那麼多為創建根據地流血犧牲的老同志怎麼會都是反革命？夏曦答曰：「這些人是為了破壞革命才參

加革命，為了瓦解紅軍而發展紅軍，為了搞垮根據地而建設根據地。」^②如此悖謬邏輯居然成為大開殺戒的論據。夏曦甚至差點對賀龍下手。李銳說：「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只剩下四個黨員。許多地區是自己殺得站不住腳的。」^③

延安整風審幹，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被打為「紅旗特務」，被整得死去活來，自殺前留詩：「冤死慈親手，淚眼望飛雪；委屈並無怨，忍痛護高節。」成都地下黨市委書記韓天石（後為中紀委書記），在延安「搶救」中被打為「紅旗特務」，1949年後又入「高饒反黨集團」。成都地下黨員胡績偉，延安「搶救」中險些「入圍」，西北局組織部長李卓然力保，才成「漏網之魚」（《紅岩兒女》，頁713-14）。

對於地下黨的集體命運，難道唏噓一番、歎一口氣就算了？不該找找裏面的原因麼？中共不是最講客觀規律與必然性麼？這會兒怎麼不言言了？

知識份子出身的地下黨乃中共黨內相對理性的健康成份，民主自由是他們爭取的目標。尤其是1940年代入黨的南方局系統學生黨員，未經延安「整風」、「搶救」，不知「運動」厲害，有話直說，沒有自我保護意識，1949年後成為「檻上芝蘭」^④。當他們被時代大潮裹挾至反右、文革，發現「得到的並不是我們想要的」，而且比原來都不如，已經來不及了，眼睜睜看着戰友親友一個個被「合法冤枉」，最後冤枉到自己，株連眷屬牽累後代。此時，他們只能啃嚼苦

知識份子出身的地下黨乃中共黨內相對理性的健康成份，民主自由是他們爭取的目標。1940年代入黨的南方局系統學生黨員，未經延安「整風」、「搶救」，不知「運動」厲害，沒有自我保護意識。

「兩頭真」老人反思的兩條底線，即：一、馬克思主義；二、革命價值。「紅岩一代」1949年前不怕犧牲爭取民主自由，1949年後竟容忍新式獨裁專制；1949年前張揚個性、桀傲不馴，1949年後竟沉陷個人迷信、成為「馴服工具」。

果，熬着受着，沮喪痛苦，眼瞅着曾經為之那麼激動的「革命」一點點變味，自己一生的「意義」隨之飄逝。

工農「打敗」知識份子，馬識途認為根子在於治國策略上發生原則性錯歧，即在如何利用資本主義積極因素上發生原則性分歧：

這樣，革命知識份子就與小農意識、封建意識深厚而又居於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發生矛盾了。那些人為了鞏固自己手中的權力，非要「改造」、打擊這些知識份子不可。本來，進城之後更應改造的是農民意識、封建意識，這些沒有改造，反而用這些意識「改造」知識份子，怎能不出麻煩？……超越階段，造成的損失太大了。搞出個充滿農民意識、封建意識的社會，弄成個事事高度集中、專制盛行的國家，知識份子不能接受，挨整是跑不脫的。……幾十年來，各地各級仍然有大大小小的「皇帝」壓在人民頭上，不少鄉村裏，至今還有。（《紅岩兒女》，頁703）

穆廣仁如此反思²⁶：

在上個世紀40年代投身中國革命的我們這一代人……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從未料到中共解放後一段時間實施的「左禍」。在我所接觸到的那個同時代人當中，極少對他們當時的追求有所悔的……這就是我以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語深為感動的原因：「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那麼，除了毛澤東個人因素之外，發生這一切的深層次原因是甚麼？先後就讀中央大學、西南聯大的高才生馬識途，中央大學畢業生穆廣仁，復旦生何燕凌都無力回答，甚至有可能不願回答，因為這已接近「兩頭真」的反思底線——赤色革命的正義性、中國共運的價值性、馬列主義的合理性。

2006年4月，前金陵大學畢業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謝韜的反思相對深刻²⁷：

建立共產主義的說教表現了共產黨人對發展先進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無能。把實現不了的許諾推向遙遠的未來，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是假民主，真專制，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七 「紅岩一代」的局限

筆者與幾位「兩頭真」老人接觸（電函來往、互贈書籍），摸知他

們反思的兩條底線，即：一、馬克思主義；二、革命價值。「紅岩一代」（或曰「解放一代」）意識到自己帶有根本性弱點——1949年前不怕犧牲爭取民主自由，1949年後竟容忍新式獨裁專制；1949年前張揚個性、桀傲不馴，1949年後竟沉陷個人迷信、乖乖成為「馴服工具」。他們自問：「明明被整得死去活來，為甚麼久久不覺悟？」承認「浪費青春」，但拒絕被評為「上當受騙的一代」。他們自評：「他們〔紅岩一代〕理想中的目標大部分未能實現，但卻很難說他們當初就作了錯誤的選擇。」^②

他們最後的底線：推翻國民黨還是必要的，後面沒有建設好「新中國」不能成為否定前面「推翻舊中國」必要性的理由，1949年前後得分開來看。何燕凌曾說^③：

能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來證明四十年代共產黨的民主說辭都是假的嗎？用後來的情況推論過去的動機，用後來的表現評價過去的對錯，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對待歷史的態度。

「紅岩一代」如此立論當然經不起輕問：既然大部分目標未能實現，又怎麼證明當初選擇的正確？既然後來的行動背離此前的諾言，再美好的動機還有甚麼意義？天翻地覆、伏屍千萬的革命，能用「動機」來論證其價值麼？難道實踐不是檢驗真理檢驗歷史的唯一標準麼？

迴避理論歸納與人生「總決算」，似成「延安一代」、「紅岩一代」捍衛一生價值的「最後防線」，或曰「代際局限」吧？李慎之、謝韜都已承認「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不可能實現，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削肉還母，剔骨還父」——送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東西」^④，就是未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包括中共革命）的價值進行總判認與總決算。

赤潮禍華，最實質性的傷害是擰歪了數代士林的思想，倒置經驗凝成的社會價值標準，不是馬列主義服務中國，而要中國服務於馬列主義。「延安一代」、「紅岩一代」至今還在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判認社會，還在用青年時代接受的赤色觀念運行思維，甚至還要求下一代接受他們的價值標準。

無論如何，《紅岩兒女》、《拒絕奴性》等「兩頭真」人物的晚年傳記與反思，表明這場赤色大革命正進入歷史清算的「收官」階段——紅色兒女用顫抖老手為紅色革命圈畫句號。從這一意義上，「兩頭真」人物傳記歷史價值，將得到史家深入挖掘。

《紅岩兒女》、《拒絕奴性》等「兩頭真」人物的晚年傳記與反思，表明這場赤色大革命進入歷史清算的「收官」階段。「兩頭真」人物傳記歷史價值，將得到史家深入挖掘。

註釋

① 穆廣仁：〈「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載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一生都在波濤中》，第三部，下冊（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頁711。

- ② 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27。
- ③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76。
- ④ 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從潛流到激流》、《紅岩兒女——從漩流到洪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 ⑤ 何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的罪與罰——中共地下黨人之厄運》（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8）。
- ⑥ 沙尚之主編：《百年纏綿——沙文漢陳修良畫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頁18、21、162。
- ⑦ 張友漁：〈在少奇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革命回憶錄》，第二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5。
- ⑧ 方方：〈三年游擊戰爭〉，載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第十八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頁137。
- ⑨ 榮高棠：〈關於南方局的組織機構和南方局組織部的情況〉，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二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64。
- ⑩ 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周年〉，載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5。
- ⑪ 楊超：〈在西南四省區黨史資料徵集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四川黨史研究資料》，1983年第1期，頁42。
- ⑫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400-404。
- ⑬⑭⑮ 鄧小平：〈論《忠誠與老實》〉，《南京通訊》，第4期，1949年10月1日，頁3-21；11；18-19。
- ⑯ 筆者函訪陳修良之女沙尚之，2014年1月11日。沙女士回函其母親此時向主席台遞條子。
- ⑰ 龐智：〈古城門「胡騎」——西安地下鬥爭片斷回憶〉，載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第十六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頁217、240。
- ⑱⑲ 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頁401。
- ⑳ 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從漩流到洪流》，第二部，下冊（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頁736。
- ㉑ 周濤、吳弼著：〈雲南地下黨和「邊縱」冤案紀略〉，載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一生都在波濤中》，第三部，上冊（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頁80-81。
- ㉒ 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97。
- ㉓ 李銳：〈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載《李銳論說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8。
- ㉔㉕ 謝韜：〈我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載《紅岩兒女》，第三部，上冊，頁15；29、27。
- ㉖ 穆廣仁：〈奧斯特洛夫斯基「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頁29。
- ㉗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序言）〉，載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上卷（香港：書作坊，2008），頁xxviii-xxix、xxx-xxxi。
- ㉘ 燕凌：〈《紅岩兒女》第三部前言〉，載《紅岩兒女》，第三部，上冊，頁3-4。
- ㉙ 燕凌：〈謝韜一代人的追求——紀念謝韜同志逝世一周年〉，載《紅岩兒女》，第三部，上冊，頁32。